

Opinion

■财经时评

为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寻找最优平衡点

促进就业必须解决好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矛盾、城市化与城镇就业压力的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知识型失业的矛盾。化解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的矛盾,不仅要纠正投资结构的偏差,也要尽快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李长安

《就业促进法》昨天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标志着我国在促进就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意味着政府将促进就业这个关系到民生之本的重大问题正式纳入到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当然,促进就业除了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外,还需要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当前的就业问题,认真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导致就业压力不断扩大的各种矛盾。

具体来说,促进就业必须解决好以下三大矛盾:

一是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矛盾。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情况看,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的却是失业不断扩大的奇怪现象。统计数字显示,从1996—2006年,我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而同期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从3.0%上升到

4.5%,目前的失业总人数已经接近1000万人。这种违背肯尼迪定律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一大特点。

这种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的“悖论”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就在于我国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目前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50%以上。但是,引人关注的是,投资结构的偏差使得高投资增长率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平均投资就业增长弹性为0.286,90年代降到0.05左右,目前该系数已经不足0.04。这说明投资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大降低了。此外,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就业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就业的稳定性也不够好。

二是城市化与城镇就业压力的矛盾。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每年都在以平均1%的速度推进。与此同时,

每年涌入城镇的农村转移人口大约有1000万以上。而在城镇内部,每年还有近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另外还有1400万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转移无疑给本来就紧张的城镇就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知识型失业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低技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要特征。不过,经历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高技术和高效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技队伍的不断壮大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可是,与这种要求形成对比的是,一方面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知识型失业现象的存在。根据教育部统计,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5万,待业人数约为34万,占总人数的30%。到2005年,待业人数增加到93万,比2001年增加了

近两倍。而2007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495万,比2006年的413万增加了82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由此可见,要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有很强的宏观思维。首先,化解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的矛盾,不仅要纠正投资结构的偏差,也要尽快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其中又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深刻反思我国目前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经济“重型化”倾向。中国本来是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国家,但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化倾向,恰恰与这种比较优势发生了偏差。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呈现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的扩张期的特征。近些年来虽然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基本格局仍未根本改变。比如在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其中重工业增长19.1%,轻工业增长15.9%。工业加速主要是由重工业加速拉动的,而重工业快于轻工业的增速差由上年同期的2.3个百分点扩大到今年的3.2个百分点。由于重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大大低于轻工业,重工业的超常发展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步增加。因此,如何减缓国民经济的重型化倾向,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应是下阶段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

其次,要把城乡统一就业纳入促进就业的大框架中。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表面上来看好像会抢占城镇人口的就业岗位。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笔者的研究表明,越是农民工集中的地区,经济越是发达,而城镇失业率反而越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值,说明农民工不仅对城镇职工的饭碗不会构成威胁,反而会促进当地就业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比如这次城镇居民医保体制改革,就明确提出要将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医保体系,这无疑是在加快城乡就业一体化的一大进步。

最后,知识型失业的存在,背后反映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其实,我国的知识型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型人才的作用、防止出现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除了要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让知识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寻找到的最优位置外,也对现行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利用机制提出了挑战。另外,知识型人才也是自主创业的主力军,这次《促进就业法》对此给予了多种扶持,相信对于解决知识型失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央企重组不能以强化垄断来获利

◎葛丰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近日表示,三年内,国资委将根据利润水平、成本控制能力等因素构成的综合指标对中央企业排定座次。届时做不到行业前三名的,将被国资委强制重组。

从求大到求强,中国的国企改革思路一路走来不断明晰,而在实践层面,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国有资产正在迅速向大型国企集聚,这些企业创造了国有企业几乎所有的利润;而众多的国有中小企业,由于在竞争性市场中亏损严重,生存困难,正通过兼并、转制等一系列途径逐渐退出市场。

至少在可观测的范围内,中国的国企改革成就不错。2005年,全部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047亿元(不包括金融类国企),同比增长25%,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央级国企实现利润6413亿元。大体来说,这些一度境况不佳的企业,在“保值增值”、“做大做强”等方面进展显著。

恰恰因为形势变迁,新的担心和争论同样在生成。譬如说,近年来中国全部企业利润不断呈现向上游国有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曾有统计显示,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此外,在本轮A股牛市启动前,中石油一年的盈利相当于上一两年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一半还多。问题是,这些高度垄断国企交出的漂亮的成绩单,能够作为中国国企改革成功的有力证据吗?随着中央级国有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其本已坐拥的垄断特权是否会继续得到强化?

这其实更应地涉及国企改革最终使命之所在。从根本上来说,除了因产权虚置而带来的“国企病”以外,受制于传统的发展战略思维,我国大部分大型国企集中在并不具备比较优势、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和产区,这样的产业选择决定了这些企业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上不具有自生能力,很难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因此,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

于是,为了维护国有资产的权益,为了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国资管理部门被迫以强化垄断来自我获利——这确实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而其日益暴露出的弊端则在于,垄断条件下所产生的价格扭曲,市场主体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是错位的。所有这一切,与建立完善市场经济的大目标并不契合。

刚刚获得通过的《反垄断法》将从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企业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的现状,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垄断对市场造成的破坏。大体而言,中国企业管理体制所应着眼的大处主要是,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和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为包括反垄断以及国资管理部门本身公司化等在内的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动力。

电信资费价格下调不能仅靠呼吁

◎陈军华

最近两天,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中消协、北京市消协共同主办的“推动电信资费改革论坛”上,来自信息产业部、社科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人大经济学院、邮电大学的专家学者们,集体“炮轰”现有电信资费制度,呼吁进行实质性的价格听证来降低资费。

综合各方报道,目前,电信资费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收费过高。目前打电话到英美,国内报价为每分钟2.4元,而从英国打回来只有约0.14元,相差十几倍。很多国内与国外通话,约定从境外打进来,导致许多钱被外国电信公司赚走。电信资费过高成为国民的负担。据统计,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消费者用于电话消费的金额不到收入的5%,而国内则达到了8%至10%。

二是不合理的月租费继续存在。月租费的收取本来就含糊不清,如果是号码资源占用费,根据规定,号码作为有限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号码资源占用费应由电信经营者承担(一个电话号码国家每月向电信经营者收取一分钱),不得向电信用户收取,而电信经营者却向手机用户每月收取五、六十元的月租费;如果月租费是通常意义上的租用费,但消费者并未向电信运营商租用有关物品,手机和固定电话都是自己买的,消费者享



漫画 刘道伟

受的通话服务也是通过缴纳话费购买的,月租费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三是漫游费。手机漫游成本几乎为零,但目前我国的漫游费以0.8元/分钟或0.6元/分钟标准收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没有漫游费,在欧洲,国际漫游结算费正在被强制性取消。我国手机漫游费收费之高堪称世界之最——1分钟漫游费的费用相当于4分钟本地通话费!

四是电信资费标准混乱。手机收费各自定价,手机通话费北京每分钟0.6元,上海每分钟是0.3元,北京上海同为国际大城市,价格相差竟然能达到1倍之多。

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消费者

苦不堪言,电信方面的投诉居高不下,屡屡位居投诉榜首。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消费者和消协等公益性组织也不断发出呼吁,要求电信部门降低收费标准,但电信部门基本我行我素。倘若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通过呼吁来达到降低电信资费目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我国电信资费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电信部门处于行业垄断状态,竞争不充分。二是至今还没有对垄断的电信行业进行有效监管的法律保障。

要解决现存问题也应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竞争是提高效率、节约成本、降低价格的捷径。但在我国电信市场,由于市场竞争主体数量太少,

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局面。目前,我国电信市场上有六家电信运营商,但具体到固定电话市场只有3家、移动市场只有2家、卫星通信市场只有1家,竞争不充分。根据经济学常识,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降低服务价格,但是,这一原理只有在非垄断状态下才有效。如果企业占据垄断地位,它不降低成本也能获取超额利润。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企业的利润率高于20%,而其他国家的利润率甚至不到1%!我国电信行业在管理水平、经营水平、服务质量比不上美国的情况下,利润率却是美国的20倍,如果没有垄断因素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在做大做强电信企业的同时,也应该采取措施,打破垄断,以形成良性竞争的格局,靠竞争推动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

除此之外,还应尽快出台电信法。在目前我国电信立法体系中,缺少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专门调整电信关系的国家法律。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拥有一部恰当的《电信法》,才能确保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才能加大监管和惩处力度,才能有效避免电信资费过高和收费混乱的状况,也才能创造并保持有序的竞争环境。当然,这需要电信法的制定保持客观公正,避免被部门利益和其他既得利益主体所主导。

■上证观察家

警惕“荷兰病”魔咒袭扰中国经济肌体

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人力资源。中国丰沛的人力资源,将会是一个比自然资源更具竞争力的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命运的有力因素。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依赖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模式,逐渐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背景下人力资本不断得到提升的模式,这是摆脱比较优势陷阱,脱离“荷兰病”侵袭之困扰的唯一途径。

◎杨英杰

近日,中国商务部官员对自去年11月起,美国商务部不断发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今年前6个月累计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1%;今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意将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与中国不断激增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联系起来,但是,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人民币币值的压力会通过各种途径释放出来,我们认为,反倾销只是手段之一。

大量的贸易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而在为我们带来大量外汇收入的出口产品中,尽管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外贸总额比重不断提升,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两高一资”产品仍占相当比重。特别是

资源型产品的大量出口直接影响到我国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严重的是,过度依赖资源型产品(包括初级产品)的出口很容易染上“荷兰病”进而拖累中国经济。

发展经济学常常提到的“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20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经济暂时出现了繁荣,可由于过分依赖天然气的出口,由此而来的荷兰病效应使得荷兰经济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所谓荷兰病效应是指,来自于自然资源出口收入的迅速增加导致本国货币升值,由此引起的贸易条件恶化将使非资源型部门(如农业和制造业)变得不具竞争力,并且更加依赖于进口保护和政府补贴以维持其存续,而出口减少和贸易保护则间接妨碍了经济增长。另外,由于资源部门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率,物质资本和人

力资本将会转移至初级产品部门,制造业部门便因此而萎缩。在制造业存在递增规模报酬的条件下,专业化于资源采掘业就会损害经济效率,短期的资源收入却削弱了长期增长的动力。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即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

自然资源对于我国经济的推动有目共睹,统计显示,以原煤、原油和生铁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产品,1985年以来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呈同向上升趋势,只是在不同的区间范围内,这种趋势相关性程度各异。在1993年之前,相关性程度更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此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曲线逐渐远离资源产品的依赖路径,自然资源的影响力渐趋下降。在1996—2000年间,原煤产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表现出反向的联系。在2000年之后,随着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带动原煤、

生铁等资源投入品需求和产量骤然上升,同时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又表现出较强的同向相关性。总的来说,自然资源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

但是,尽管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经济得益于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原料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但从国内各个省份经济发展情况看,仍逃不脱“资源诅咒”,即越是资源丰富的省份,其经济发展越是缓慢。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平均经济增长率排名前列的大部分是资源缺乏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这几个省份,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的水平,超出全国平均增长率约2—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资源充裕的辽宁、山西等省份却增长较慢,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

■雅玲随笔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中要防范美元可能大涨

◎谭雅玲

目前国内外金融市场表现出不同的价格趋势。从国际金融市场看,美国股票带动全球股票价格下跌趋势十分瞩目,而我国股票市场则反向运行持续高涨,一方面国际股票市场特别是美国股市下跌心理依然稳定,但另一方面我国股市高涨中的市场心理不稳定却在扩大,投资者有点“心里发毛”。

在美国次级债风暴爆发之前,全球金融市场的焦点是流动性过剩的忧虑,次级债爆发导致出现发达国家所谓的流动性不足,主要发达国家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大规模向商业银行、金融体系和市场的注资举措,到目前并没有完全抑制市场恐慌,甚至市场价格的波动已经改变政策方向,尤其是导致经济悲观氛围上升,紧张心理蔓延。美联储注资资金缺口之后美国商业银行的资金需求意愿冷漠,几家大银行的拆借并没有给其他银行产生示范和带动作用。而欧洲央行在美联储注资之前,其恐慌程度超出现实,对次级债问题的判断也逐渐冷静,过于紧张心理已经平静。最有意思的是日本央行,注资举措是进进出出,难以琢磨,日元汇率和日本股市也变幻莫测,日本受次级债影响十分有限,更多的是心理紧张。

在正在蔓延的全球美元恐慌心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唱衰美元和减持美元趋势突出,但是美元汇率却与市场恐慌心理并不一致,美股暴跌时美元指数上升,美元兑欧元上涨时,美元兑日元下跌,这似乎不是市场正常的反应。在全球流动性过剩中,我们需要防范未来美元可能的大涨趋势,与市场预期完全反向的美元强势趋势将会出现。

当这样一种局面到来的时候,美元将收获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利益,进一步缓解美国结构性矛盾和压力,补充资本流入对其经济和市场的支撑,维持美国经济稳定。回顾历史,美元每一次遇到突发因素和恐慌心理的反向调整都是有据可寻的。如1998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美国经济一片悲哀,而欧元则一路高歌。但是随后美元又一路高涨,将欧元压制到0.82美元。再如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之前,市场预期美元在战争打响之后将一路下跌,但事与愿违,开战后美元却呈现上涨趋势,美元兑欧元汇率从3月20日的1.10美元持续走高到4月初的0.97美元,瞬间则达到0.95美元。

因此,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价格的迷局中,我们也需要超越眼前的情况,从美国经济、金融实力、规模、机制、效率等多角度看待美国因素和美国问题,目前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不足带来的进一步释放流动的未来前景将十分严重,流动性泛滥失控将导致信用、价值进一步失控,并最终可能演变为新型的金融危机,最终回归原点美元。而当这一情况到来的时候,全球将进一步依存美元经济,因为任何经济体或货币体难以有美国的能量和效率来操纵市场、操纵价格以及设计方向指引。

结合到我国实际状况,如果从国家经济规模和效率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差距十分巨大,并非短期可以消除,尤其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信誉和信用度与美元升值与贬值的不良影响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金融战略应对恰当,或我国主动性充足,恰好相反,外部特别是美国应对我国的战略政策与策略愈加具有针对性,未来我们面对的外部压力将更加严重和复杂,因此我们的金融预警和危机意识还需要大大提升。

我国目前是一个市场化程度有限,开放度不大的经济体,自我体系、自我封闭对外部并不会当前如此巨大的竞争局面,但是我国的信誉信用度在不断提高,负责任大国形象是一种重要的信用资源和支持平台。从成熟市场经济体经历的路径看,我们当前阶段的可能风险他们十分清楚,进而有时采取有针对性要求开放,有针对性价格炒作,有针对性的战略策略运用,对此我们需要警惕,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国际规则的不公平倾斜性不利于我国自主发展、自主开放,我们面临的风险大于机遇,这是我们应该理智判断的基点。

的负面影响。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加重了对自然资源需求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中国工业化表现出明显的资源消耗型特征,更容易使中国经济在“荷兰病”的侵袭下虚弱不堪。市场环境变化特别是市场供求变化导致的因自然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意外之财”,很容易使一个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在比较优势陷阱中不可自拔。

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在自然资源,这已是共识。那么比较优势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人力资源。无论从短期还是一个较长时期来看,中国丰沛的人力资源,将会是一个比自然资源更具竞争力的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命运的有力因素。特别是,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加上不断深化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会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作用,透过世界经济发展史清晰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依赖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模式,逐渐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背景下人力资本不断得到提升的模式,这是摆脱比较优势陷阱,脱离“荷兰病”侵袭之困扰的唯一途径。